

饒宗頤  
著

饒宗頤

史學論著選



上海古籍出版社

饒宗頤 著

饒宗頤

史學論著選

口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饒宗頤史學論著選**

饒宗頤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發行所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譯文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26.125 插頁5 字數546,000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

ISBN 7-5325-1250-9

---

K·125 定價：17.95元

## 饒宗頤史學論著選序

季羨林

饒宗頤教授是著名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學家、經學家，又擅長書法、繪畫，在中國臺灣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國家，有極高的聲譽和廣泛的影響。由於一些原因，在我國大陸，他雖然也享有聲譽，他的論著也常常散見於許多學術刊物上，而且越來越多；但是他的著作還沒有在大陸上獨立出版過，因而限制了大陸學人對饒先生學術造詣的了解。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十分遺憾的事。現在應中山大學胡守為教授之請，饒先生自己編選了這一部《饒宗頤史學論著選》，準備在大陸上出版，這真是史壇佳話，大陸學人會熱烈歡迎，這是毫無疑問的。

完全出我意料之外，饒先生表示希望我能為他的選集寫一篇序言。我毫不遲疑地答應了下來，並不是因為我自認有這能力，我的能力是不夠的，而是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光榮的任務和職責。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古人對此早有明訓。大陸和大陸以外的同行們是應該相應、應該相求的。這對繁榮學術、交流感情，會有很大的裨益，更何況是像饒宗頤教授這樣一個著作等身的學

者呢？幾年以前，饒先生把自己的大著《選堂集林·史林》三巨冊寄給了我。我仔細閱讀了其中的文章，學到了很多東西。在大陸上的同行中，我也許是讀饒先生的學術論著比較多的。因此，由我來用序言的形式介紹一下饒先生的生平和學術造詣，可能是比較恰當的。中國有一句古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即使我不介紹，饒先生的學術成果，一旦在大陸上刊布，自然會得到知音。但是，介紹一下難道不會比不介紹更好一點嗎？在這樣的考慮下，我不避佛頭着糞之譏，就毅然答應寫這一篇序言。

我首先想介紹一下饒先生的生平。

饒宗頤，字固菴，號選堂，一九一七年六月生于廣東省潮安縣。幼承家學，自學成家。自十八歲起，即嶄然見頭角。此後在將近五十年的漫長的歲月中，在學術探討的許多領域裏做出了顯著的成績，至今不衰。爲了醒目起見，我在下面列一個年表：

- 一九三五—三七 中山大學廣東通志館纂修，共三年
- 一九四四—四五 無錫國專（遷廣西時）教授
- 一九四六 廣東文理學院教授
- 一九四七—四八 汕頭南華大學文史系主任教授，兼《潮州志》總編纂
- 一九四八 廣東省文獻委員會委員

一九五二—一六八 香港大學中文系講師—教授，共十六年。其間，一九六三年，在印度班達伽(Bhandarkar)東方研究所研究

一九六八—七三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首任教授兼系主任，共五年。其間，一九七〇—七

一 美國耶魯大學客座教授，一九七二—七三 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教授，共五個月

一九七三—七八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一九七八年九月退休

一九七八—七九 法國高等研究院(1'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第五組宗教部門，客座教授，共一年

一九八〇 日本京都大學及人文科學研究所客座教授，共四個月

現為香港中文大學名譽教授(中文系)及藝術系榮譽教授。香港大學名譽文學博士。一九六一年，獲法國儒蓮漢學獎 (Prix Stanislas Julien,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Lettres)，又曾為法國科學中心(C.N.R.S.)、遠東學院(E.F.E.O)研究員。一九八〇年，被選為法京亞洲學會(Société Asiatique)榮譽會員。

現在介紹饒先生的著作。著作涉及的面很廣。根據饒先生自己的歸納，分為八個門類：

### 一 敦煌學

一、《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 香港，一九五六年

二、《敦煌曲》 與 Paul Demiéville 教授合著 法國科學中心印，一九七一年《敦煌曲  
訂補》史語所集刊

三、《敦煌白畫》 法國遠東學院考古學叢刊，一九七八年

四、《敦煌書法叢刊》 日本二玄社印，共二十九冊，已出十冊，一九八三年

五、《敦煌本文選》

## 二 甲骨學

一、《殷代貞卜人物通考》 香港大學出版社，一九五九年

二、《巴黎所見甲骨錄》 香港，一九五七年

三、《歐美亞所見甲骨錄存》 新加坡，一九七〇年

## 三 詞學

一、《詞籍考》 香港大學出版社，一九六三年 北京中華書局重印增訂本，在排印中

二、《全明詞》（稿）已交中華書局編輯部，正在補苴國內資料

## 四 史學

一、《選堂集林》 香港中華書局，一九八二年

- 二、《中國史學上之正統論》 香港龍門書局，一九七七年
- 三、《潮州志匯編》 香港龍門書局，一九六五年
- 四、《九龍與宋季史料》 香港，一九五九年

## 五 目錄學

- 一、《潮州藝文志》 《嶺南學報專號》共二期（第四卷第四期，一九三五年，第六卷第二、三期合刊，一九三七年） 又《潮州志》本

- 二、《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善本書錄》 香港龍門書局，一九七〇年

## 六 楚辭學

- 一、《楚辭地理考》 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四六年
- 二、《楚辭書錄》 香港，一九五六年
- 三、《楚辭與詞曲音樂》 香港，一九五八年

## 七 考古學、金石學

- 一、《韓江流域史前遺址及其文化》（收入《選堂集林》） 香港，一九五〇年
- 二、《唐宋墓誌》（法國遠東學院藏拓本） 香港中文大學與法國遠東學院合印，一九八一年



- 三、《雲夢秦簡日書研究》 香港中文大學考古藝術中心專刊，一九八三年
- 四、《曾侯乙墓鐘磬銘辭研究》 同上，排印中
- 五、《楚帛書》（考證現存美國之Chu silk manuscript） 香港中華書局，排印中
- 六、《星馬華文碑刻繫年》（收入《選堂集林》） 新加坡，一九七二年

## 八 書畫

- 一、《黃公望及其富春山圖》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專刊，一九七七年
- 二、《虛白齋書畫錄》 日本東京二玄社，一九八三年

從上面這個著作表中可以看出，饒宗頤教授的學術研究涉及範圍很廣，真可以說是學富五車，著作等身。要想對這樣浩瀚的著作排比歸納，提要鉤玄，加以評介，確非易事，實為我能力所不逮。因此，我祇能談一點自己的看法，而且主要是根據本書中所選的論文，祇在十分必要時，才偶爾超出這個範圍。

從世界各國學術發展的歷史來看，進行學術探討，決不能固步自封，抱殘守闕，而是必須隨時應用新觀點，使用新材料，提出新問題，摸索新方法。祇有這樣，學術研究這一條長河才能流動不息，永遠奔流向前。討論饒先生的學術論著，我就想從這個觀點出發。我想從清末開始的近百多年來的學術思潮談起。先引一段梁啟超的話：

自乾隆後邊徼多事，嘉道間學者漸留意西北邊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諸地理，而徐松、張穆、何秋濤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記》、《漢書西域傳補注》、《新疆識略》，穆有《蒙古遊牧記》，秋濤有《朔方備乘》，漸引起研究元史的興味。至晚清尤盛。外國地理，自徐繼畲著《瀛環志略》，魏源著《海國圖志》，開始端緒，而其後竟不光大。近人丁謙於各史外夷傳及《穆天子傳》、《佛國記》、《大唐西域記》諸古籍，皆博加考證，成書二十餘種，頗精贍。（《清代學術概論》）

梁啟超接着又談到金石學、校勘、輯佚等等。其中西北史地之學是清代後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中國學術史上，這是一個新動向，值得特別重視。金石學等學問，雖然古已有之，但此時更爲繁榮，也可以說是屬於新興學科的范疇。這時候之所以有這樣多的新興學科崛起，特別是西北史地之學的興起，原因是多種多樣的。趙甌北的詩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應用到學術研究上，也是適當的。世界各國的學術，都不能一成不變。清代後期，地不愛寶，新材料屢屢出現。學人的視野逐漸擴大。再加上政治經濟的需要，大大地推動了學術的發展。新興學科於是就蓬蓬勃勃地繁榮起來。

下面再引一段王國維的話：

古來新學問之起，大都由于新發見之賜。有孔子壁中書之發見，而後有漢以來古文家之學。有趙宋時古器之出土，而後有宋以來古器物古文字之學。惟晉時汲冢竹書出土後，因永嘉之亂，故其結果不甚顯著，然如杜預之注《左傳》，郭璞之注《山海經》，皆曾引用其說，而竹書紀年所記禹、益、伊尹事蹟，至今遂成爲中

國史學上之重大問題。然則中國書本上之學問，有賴於地底之發見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女師大學術季刊》，第一卷，第四期，附錄一：《近三十年中國學問上之新發見》，王國維講，方壯猷記注）

這裏講的就是我在上面說的那個意思。王國維把「新發見」歸納為五類：一、殷虛甲骨；二、漢晉木簡；三、敦煌寫經；四、內閣檔案；五、外族文字。我覺得，王靜安先生對中國學術史的總結，是實事求是的，是正確的。

近百年以來，在中國學術史上，是一個空前的大轉變時期，一個空前的大繁榮時期。處在這個偉大歷史時期的學者們，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意識到這種情況，也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投身於其中。有的學者仍然像過去一樣對新時代的特點視而不見，墨守成規，因循守舊，結果是建樹甚微。而有的學者則能利用新資料，探討新問題，結果是創獲甚多。陳寅恪先生說：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陳垣燉煌劫餘錄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一九八〇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先生借用的佛教名詞「預流」，是一個非常生動、非常形象的名詞。根據這個標準，我們可以說，王靜安先生是得到預流果的，陳援菴先生是得到預流果的，陳寅恪先生也是得到預流果的，近

代許多中國學者都得到了預流果。從饒宗頤先生的全部學術論著來看，我可以肯定地說，他也已得到了預流果。

我認爲，評介饒宗頤教授的學術成就，必須從這一點開始。

談到對饒先生學術造就的具體闡述和細致分析，我想再借用陳寅恪先生對王靜安先生學術評介的幾句話。陳先生說：

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獯豸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蒙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爲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

陳先生列舉的三目，我看，都可以應用到饒先生身上。我在下面分別加以論述。

## 一 地下實物與紙上遺文

饒宗頤教授在這方面的成就是非常顯著的。一方面，他對中國的紙上遺文非常熟悉，了解得

既深且廣。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視國內的考古發掘工作。每一次有比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討研究，以之與紙上遺文相印證。他對國內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簡直達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即使參觀博物館或者旅遊，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時時注意對自己的學術探討有用的東西。地下發掘出來的死東西，到了饒先生筆下，往往變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再加上他對國外的考古發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靈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揮若定。研究視野，無限開闊。國內一些偏遠地區的學術刊物，往往容易為人們所忽畧，而饒先生則無不注意。這一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把饒先生利用的地下實物歸納起來，約可分為八項：

- (一) 古陶；
- (二) 甲骨、金文(鼎彝)；
- (三) 鐵器、絲綢；
- (四) 秦漢殘簡；
- (五) 出土寫本(繒書、帛書等)；
- (六) 碑銘；
- (七) 敦煌卷子；

(八) 吐魯番文書。

我在下面依次談一談。

(一) 古陶

在《說卍(Svastika)——從青海陶文試談遠古羌人文化》一文中，饒先生從青海樂都縣柳灣墓地出土的陶器上的花紋符號聯想到古代雅利安人舊有的卍符號，又聯想到世界其他各地的，特別是美索布達米亞的類似的符號，從而推論其間的關係，並論到古羌人的文化，時有柳暗花明之妙。可能有人對這種推論方法提出懷疑。但是這畢竟能啓發人的想象，開闊人的視野。幻想力和聯想力對學術探討有時候是不可缺少的。

(二) 甲骨、金文(鼎彝)

在《談「十干」與「立主」——殷因夏禮的一、二例證》這篇論文中，饒先生利用出土資料，特別是甲骨文，以及古代典籍，比如三國譙周的《古史考》、漢代的《白虎通》等等，還有《禮記》、《史記》等等，來研究夏代文化。在這裏，饒先生特別強調甲骨文的重要性。他寫道：

我們還得把考古遺存同傳世文獻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和研究。……值得特別提出的是甲骨文，在甲骨文中有許多關於商代先公先王的記載，在時間上應該屬於夏代的範疇，可看作是商人對於夏代情況的實錄，比起一般傳世文獻來要可靠和重要得多，我們必須而且可以從甲骨文中揭示夏代文化的某些內容，這

是探索夏文化的一項有意義的工作。總之，我認爲探索夏文化必須將田野考古、文獻記載和甲骨文的研究三個方面結合起來，即用「三重證據法」（比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多了一重甲骨文）進行研究，互相抉發和證明。

饒先生的意見同陳寅恪先生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的「三重證據法」，雖然王靜菴先生對甲骨文的的研究也是異常注意的。

在《道教原始與楚俗關係初探——楚文化的新認識》這篇論文中，饒先生一方面利用馬王堆出土的繒書論證楚地的月名，另一方面又利用許多出土的鐘磬銘推測出楚國使用的律名，又利用寧鄉出土的人面方鼎，推測出楚地信仰黃老之學由來已久；東漢三張之設鬼道，爲人治病請禱，這樣的活動秦漢之際楚地已極普遍。饒先生把這一些現象綜合起來，探討了楚文化問題，並指出王國維對楚的地域盡量縮小的做法，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

在本書入選的論文以外，還有許多篇論文利用甲骨文、金文和鼎彝等以闡明歷史事實，見《選堂集林·史林》等書，這裏不再贅述。

### （三） 鐵器、絲綢

在《道教原始與楚俗關係初探》這一篇論文中，饒先生除了利用上面提到的那一些地下遺物之外，還利用了從長沙一百八十六座戰國墓中出土的鐵器，從馬王堆和江陵馬山出土的絲綢，以

論證楚文化，從而提出了嶄新的見解，解決了一些以前沒有解決或者根本沒有提出來的問題。我認爲，這是有說服力的。

#### (四) 秦漢殘簡

在利用殘簡方面，饒先生更顯得得心應手。在《唐勒及其佚文》一文中，他利用山東臨沂出土的殘簡《唐革賦》，以及其他一些文獻輯出了唐勒的一些佚文。在《漢書》中，唐勒列於宋玉之前，其賦四篇全部佚失。饒先生對唐勒的輯佚工作爲楚辭研究提供了新的資料。

在《說零》一文中，饒先生利用了甲骨文、敦煌卷子、《廣雅釋詁》、《開元占經》等等，論證了中國零字符號與印度等地同一個符號的關係，又利用長沙、信陽竹簡及楚繒書研究了零字的形象；在這裏，零字的形象○不是圓形，而是橫式長方形。

#### (五) 出土寫本（繒書、帛書等）

在《略論馬王堆《易經》寫本》一文中，饒先生把馬王堆三號墓所出帛書《易經》與傳世本《易經》對照，研究了這一部經典中的許多問題。在《再談馬王堆帛書周易》中，同樣提出了，而且解決了一個新的問題。在《五德終始說新探》一文中，他利用了馬王堆出土的《老子甲本》後《佚書》探討了五德終始說的來源問題。五德終始說向來被認爲出自鄒衍。饒先生則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了此說實當起於子思的這一個新看法。



(六) 碑銘

饒先生在這一方面上的創獲是非常突出的。他利用碑銘的範圍很廣，從中國藏碑一直遠至法國所藏唐宋墓誌，都在他的視野之內。《論敦煌石窟所出三唐拓》一文主要從中國書法的觀點上來研究伯希和攜走的三個唐代拓本。在《從石刻論武后之宗教信仰》一文中，他利用碑銘探討了武后的信佛問題。幾十年以前，陳寅恪先生在他的論文《武曩與佛教》中曾詳細探討過這個問題。他談的主要是武后母氏家世之信仰和她的政治特殊地位之需要。他指出，武后受其母楊氏之影響而信佛，她以佛教為符讖；他又指出，《大雲經》並非偽造；對唐初佛教地位之升降，他作了詳細的分析。總之，陳先生引證舊史、與近出佚籍，得出了一些新的結論。陳先生學風謹嚴，為世所重；每一立論，必反覆推斷，務使細密周詳，這是我們都熟悉的。但在《武曩與佛教》這一篇文章中，陳先生沒有利用石刻碑銘。饒先生的這一篇文章想補陳先生之不足，在這裏充分利用了石刻。他除了證實了陳先生的一些看法之外，又得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他指出，武后在宗教信仰方面一度有大轉變，晚年她由佛入道；他又指出，武后有若干涉及宗教性之行動，乃承繼高宗之遺軌。陳、饒兩先生的文章，各極其妙，相得益彰，使我們對武后這一位「中國歷史上最奇特之人物」（陳寅恪先生語）的宗教信仰得到了一個比較完整的了解。

在《法國遠東學院藏唐宋墓誌引言》一文中，饒先生詳細敘述了法京所藏唐宋墓誌的情況。他